

中国  
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  
文库

# 性理与岐黄

徐仪明 著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理与岐黄/徐仪明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9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ISBN 7-5004-2061-7

I. 性… II. 徐… III. 理学-关系-中医学 IV. R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5793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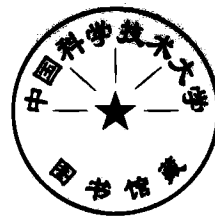
华龙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62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9.70 元





## 作者简介

徐仪明 1952年12月28日生于开封,原籍苏州。早年从事医疗工作。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1982年获哲学学士学位。后分配至《中州学刊》任编辑。1991年再次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199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于河南大学管理科学系(政治系)执教。著有《外丹》(即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主编《中国文化论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与人合作或参著学术专著六部,并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和中国科技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

## 内 容 提 要

中医学从来就与古代哲学有不解之缘。《黄帝内经》为古代医典的代表作。宋代以后,由于儒者多通医道,理学所探讨的重要范畴如太极、阴阳、理气、心性等,与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传统医学,融汇成为一个新的富有医哲两方面特点的理论体系,这不仅使传统儒学得以改变面貌,而且使古代科技思想特别是医学思想出现了新的格局。

本书作为一部开拓性的研究著作,在注重探讨一些有争议的学术问题的同时,较为全面地揭示了传统医学与宋明理学之间错综复杂、相互渗透的内在联系,可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古代的儒医文化现象、医易学及其他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编：胡 绳 汝 信

副主编：丁伟志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丁伟志 | 王俊义 | 王洛林 | 王家福 |
| 方克立 | 邢贲思 | 任继愈 | 汝 信 |
| 李 琮 | 李慎之 | 何秉孟 | 张卓元 |
| 张海鹏 | 陆学艺 | 陈筠泉 | 林甘泉 |
| 郑文林 | 胡 绳 | 钱中文 | 道 布 |

学术秘书：冯广裕

· 此书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

#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 出版说明

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也走上了轨道。几年来，我们已培养了一批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博士研究生。他们是我国社会科学战线上的一支新生力量。他们的博士学位论著，有的发表后已在国内外学术界中产生了影响。我社过去也出版过几本博士学位论著，受到好评。为了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社会科学事业，培养我国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改变目前我国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青黄不接的状况，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二、文库的选题、审稿和定稿，由《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编辑委员会负责。编委会由我国社会科学界的有关专家组成。

三、文库所收博士学位论文，是从已通过学位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者的论文中选出的（有的论文作者作了增补）。编委会要求这套文库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所收博士学位论文，能代表现时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因此文库的选稿和出版方针是少而精、宁缺勿滥。文库面向全国征集文稿，从征集来的文稿中加以精选，然后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将长期出版下去。

四、本文库选稿的标准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本学科的重要问题作出创造性研究的；能突破前人结论得出新的科学结论从而推动了本学科发展的；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对学科建设作出了较大贡献的；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当代重大问题作出了开创性研究的。文库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用不同学派、不同观点和风格的论著。所选博士学位论文，应具有严谨的学风，资料的搜集和运用，观点的取得和论证，都应是十分注重其科学性。编委会希望通过这一文库的出版，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生和年轻学者中，能倡导一种扎扎实实地进行学术研究而不哗众取宠的好学风。

五、《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在组织过程中，得到了我国各大学科有关专家的支持，也得到了我国社会科学博士研究生有关培养单位、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们的热情支持，我们谨此表示感谢。我们希望今后继续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尤其希望加强联系，给我们推荐和投寄好书稿。虽然我们力求把这项工作做好，但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和学识水平的限制，在文库的选稿、审稿、编辑、装帧设计以及印制上，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失误，敬希读者给予批评和帮助。

## 序

徐仪明的博士论文《性理与岐黄》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出版，他希望我能为他的书写篇序。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我感到义不容辞。

徐仪明问学于我，已近二十年，所以对他的一些情况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出身于一个医生世家，又曾专门拜师学艺，在考入大学之前行医达十年之久，因此有较深厚的中医学素养。1978年他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读本科，当时他就对中国哲学课程十分喜爱，对我开设的宋明理学专题讲座格外有兴趣，时常向我请教一些学术问题，使我感到这是一位好学深思的学生。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关于中国哲学方面的，由严北溟先生指导，不仅得了优秀而且顺利发表了。1991年他经过刻苦努力，以优异的成绩再次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跟我攻读博士学位。他选择了宋明理学与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国医学相互关联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牵涉到两门不同的学科，前人尚未做过系统的探讨，显然是具有较大的难度的。但理论探索贵在创新，就要敢于别开路径。因此我积极支持他的想法，鼓励他结合自己原有的中医学素养，继续刻苦努力，不要急功近利，而要反复沉潜，不急不躁，扎扎实实地把这一课题完成。随后他不断问学于我，我们之间也常有切磋，经过两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1994年在进行论文答辩时，冯契先生主持了会议，他及到会专家与外地学者的评审意见都给以肯定，认为这是一篇颇有特色的优秀论文，已达到博士学位学术水平。现在这篇论文经过作者修改后即将正式出版，这是很令人高兴的。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应该拓宽，研究路径

应有所突破。应下大力气把古代哲学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古代科学技术）联系起来，在引进和结合古代科技思想时，要更大胆和更自觉，以创新的学术思想，发前人所未发，只有这样才能将研究中国哲学史与拓宽新的研究领域密切联系。我认为，徐仪明同志的这篇论文在这些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值得肯定和赞许。

从本文所涉及的问题和对这些问题所作的分析来看，可知作者具有较广博的学识和较深厚的学术根柢。其对古代医学、天文学、历算学、气象学、物候学、心理学，对儒、释、道各家学说，对理学濂、洛、关、闽以及邵雍、陆王、清代朴学等诸家学派，对理学的理、气、心、性诸范畴，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作者并发掘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如程朱、许衡、吴澄等人精通医学和许多名医谙熟理学方面的内容。作者为此需要参考大量有关著作，牵涉到古今中外科学、哲学、历史、文学等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领域中的典籍，这是相当艰巨的工作。由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多具有交叉、渗透的性质，因此又要对大量典籍进行相互比较，方能沙里淘金，提炼出自己的新思想、新观点。徐仪明同志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实属难能可贵。

在对理学的评价方面，作者持一种慎重而客观的态度。由于本文以《黄帝内经》与整个中国古代医学作为理学产生发展的参照系，这一独特新颖的视角，所得出的理论结论颇与时下一些研究理学的著作在观点上有所不同。首先，作者指出《内经》对促进理学这一古代历史上的进步的哲学思潮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这具体表现在加快了宋明新儒学的哲理化进程。这不仅对以张载为代表的气学派是如此，而且对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派也是如此。其次，作者指出，《内经》既是一部科学著作，但同时也深入研究了人的精神世界，对理学中的心性学说的形成，起到尤为重要的作用。而《内经》对宋明哲人的宇宙观念的进步所作的贡献，尤其不容忽视，如“宣夜浑天合一”的宇宙模型，独具中国

特色的火论，以及医易说、运气说等，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例子。当然作者也指出《内经》对理学也有一些负面作用，如天人比附等。再次，作者还指出，理学对后世医学的发展也有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也不像某些著作所说全是消极的，而应该一分为二、客观公允地去看。作者这种评价方法符合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原则。

诚然，本论文既然是开拓性的，是前人尚未系统研究过的新论题，自然也有留待继续探索之处，比如对某些问题似可再多做一些发挥，以更充分展示古代医学与哲学之间的深层关系。但总的来说，这是一篇功力深厚、创见迭出的优秀博士论文，我高兴地推荐给广大读者。并希望徐仪明继续努力，不断探索，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取得更多更好的成就。

潘富恩

1996年7月，序于复旦大学

## 序

能够为徐仪明先生所著《性理与岐黄》一书作序，由衷感到高兴。我自认为与徐先生属于同道，深知作这类题目之不易。徐先生毅然举笔论列宋明理学与医学的复杂关系，确然是根据学术需要而做出的可敬选择。

中国哲学与中国传统医学有着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这不仅是因为人体科学、心理学和临床医学中的许多问题本来就同哲学相交织，而且因为中国学术的发展有着自己特殊的道路。中国哲学从总体上看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哲学”，即用生命的观点体察宇宙和人生。这就使得它必定要从当时的医学和生命科学中吸取很多有用的东西，加以融汇和升华。比如中国哲学讲的气、阴阳、五行、形神、天人等重要范畴，都溶入了古代医学和生命科学的思想内容。而中医学的最大特点是用系统思维即整体的方式来把握人体，把人看作天地自然和社会关系中生存的人，人身脏腑气血、表里上下也是一个有机整体。这就决定了它要走由整体到局部，由一般到具体的认识途径。因此，当医家总结临床经验，建构医理体系之时，必定要借助当时的哲学范畴，并以之作为本学科的基点。于是，哲学的气、阴阳、五行、形神、天人等概念就又回到了医学之中，指导医学同时又接受医学的检验和增补。

在系统思维的引领下，中国哲学和中医学都坚守“天人合一”的观念。认为天中有人，人中有天，天和人服从统一的规律，自然和人文相互渗透融溶。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哲学与医学的同一性。明代大医家张介宾在阐述医和《易》的关系时说：“天地之易，外易也；身心之易，内易也。”（《类经附翼·医易义》）

其实，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哲学（包括人生部分）讲的都是“外易”，中医学（包括养生部分）讲的则是“内易”，外易和内易的根本道理是一致的。正是基于此，研究中医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无论对于前者还是后者都十分重要。

但是长期以来，绝对专门化和精细分科的研究方法支配着我们，学界很少有人把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毋庸赘言，这种状况已经妨碍了这门学科的正常发展，旧有的闭门自守的格局应当打破。徐仪明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前言”中说：“拓宽、开掘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是本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我非常同意这一想法。《性理与岐黄》这部著作本身就是对中国哲学研究的一种拓展，同时用事实证明，对中国哲学现有的研究领域进行新的开发的确很有必要。

本书作者以宋明理学为中心，将先秦哲学——《黄帝内经》——宋明理学——金元明清医学按时间顺序串联起来加以考察，这就使读者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所强调的一些重要思想范畴，如太虚、神化、道德、心性等等的发展脉络以及它们的非思辨的实践性价值，有了更为清晰明白的了解，同时也为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宋以后出现众多医学学派的思想理论根源做了一定的说明。可以肯定，如果不把中医学与中国哲学联系起来研究，不顾及二者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宋明理学和金元四大医家就不可能完全说清楚。

宋明理学与医学的关系，其理艰深，其头绪浩繁，而作者的分析深入细致且富于启发性，所使用的资料充足而翔实。由于《性理与岐黄》揭开了新的层面，从新的视角展示宋明理学的历程，所以书中的不少论述和见地具有创新性，能够引起读者多方面的联想。这些与作者兼具哲学和医学的深厚学识是分不开的。

中国哲学的研究正期待着全面的根本性突破。我想，这是时代的要求。世界的发展趋势和各种有关学术研究成果使我们相

信，21 世纪和第三个一千年的前期，中国文化将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空前的巨大作用，将以完全平等的姿态和西方文化相互融合。如果从这样的座标点出发，重新审视和评价中国哲学，我们就会深深感到，尽管十几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很大进步，但是今天对它的研究状况与它历史的和未来的实际地位还很不相称，还有很多不符。我认为，必须彻底地从西方文化中心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从长远的历史的观点，确认东方文明的独立地位和发展前途，确认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并立的对称格局。以现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发展趋势为导向，重新发掘和理解中国哲学的内涵，重新认识中国哲学的发展归趋。

与中国哲学研究的情况相比较，中医学的现代研究似乎要好一些。出于临床的需要和与现代医学的比照，中医工作者们有更多的紧迫感，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也少些。而中医学在某些方面的独特疗效则常常不仅给中医工作者，而且给所有关心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人们增强信心。诚然，中医学按照自身的理论方向走上现代化的轨道，还是十分艰难的。“废医存药”的主张，用西医溶化消解中医的做法，还相当有势力和影响。但是一二百年来，面对着西方医学的严峻挑战，中医学以无可辩驳的实践证明了它的强大生命力和不可替代性，证明了它是应当也必定能够继续存在和向现代化发展的。

中医学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基本观念，集中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优点，是古代唯一保存下来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在中国文化的各个门类中，很具有典型性。可以设想，在中国文化步入人类未来的进程中，中医学现代化研究的整体突破，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化再现辉煌的开始。它的作用和影响或许不会亚于当年的指南针和印刷术吧。

因此，我以为，沟通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研究，把中医学现代化的研究信息和成果及时传送到中国哲学史学界，是有特殊和

深远意义的。就这一方面而言，《性理与岐黄》的出版对我们也有先导和启示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刘长林

1996年8月22日于北京劲松

# 目 录

|        |        |
|--------|--------|
| 序..... | 潘富恩(1) |
| 序..... | 刘长林(4) |

|         |     |
|---------|-----|
| 引论..... | (1) |
|---------|-----|

## 上篇 天 论

|                 |       |
|-----------------|-------|
| 第一章 天与太虚 .....  | (29)  |
| 第二章 气化与神化 ..... | (50)  |
| 第三章 二火与恒动 ..... | (71)  |
| 第四章 太极与阴阳 ..... | (93)  |
| 第五章 明理与契数.....  | (115) |

## 下篇 人 论

|                |       |
|----------------|-------|
| 第六章 仁术与孝道..... | (143) |
| 第七章 养德与复性..... | (169) |
| 第八章 治心与寡欲..... | (194) |
| 第九章 习静与主敬..... | (221) |
| 第十章 中庸与修身..... | (245) |

|         |       |
|---------|-------|
| 结语..... | (268) |
|---------|-------|

|             |       |
|-------------|-------|
| 后记.....     | (306) |
| 主要参考书目..... | (308) |
| 英文目录.....   | (314) |

## 引 论

宋明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以讲理、气、心、性为特色的新儒学体系从11世纪产生到17世纪衰落，历时七百年之久。理学通过理性思辨方式所形成的自然观念与伦理道德观念，长期以来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作为中国古代儒学的最后、也是最为成熟的理论形态，理学是在融摄其先前多种学术文化思想，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发育才形成的。在研究理学形成发展过程时，除了传统儒学的母本作用之外，人们对释道思想在其中的嫁接因素也颇为注意，凡此都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尤其对最具实用理性特色的传统医学及其与理学的内在关联却重视不够。《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为古代医典的代表作，由于“其言深，其旨邃以弘，其考辨信而有征，是当为医家之宗”（明宋濂语），曾倍受理学中人的瞩目，并进行了反复的探究，使之成为他们构造理论体系、发明心性义理之辨的重要参考书。关于如何认识、评价宋明理学汲取和借鉴《内经》中的有关思想资料以及理学成熟后又反转对医学产生巨大影响的这一历史过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亟待发掘和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

在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出现的任何重要历史现象都不是纯粹偶然的，而有着深远和深刻的政治背景和思想背景。两个表面上看相去甚远的学术体系能够发生碰撞与交汇，必定包涵有某些内在的一致性和相关度。这是首先需要进行阐释的。